

清平乐书系

东方诗魂

主编 郝志达 王锡三

07.22
1143

社

清 平 乐 书 系

东方诗魂

主 编
郝志达
王锡三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

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

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

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



东方书林之旅

清 平 坛 书

东方诗魂

东方出版社

书 名 东方诗魂

DONGFANG SHI HUN

——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

著 者 主 编 郝志达 王锡三

撰稿人 赵 季 崔胜洪 胡学常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850×1092 毫米 1/32 8.425 印张 195,000 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书 号 ISBN 7-5060-0343-0/G·45 **定价** 7.20 元

目 录

| | |
|--|-----|
| 引言 | 1 |
| 第一章 源头与凭借：寻求近真的屈原 | 7 |
| 第一节 屈原社会角色的判定 | 8 |
| 第二节 屈原爱国与否的争论 | 31 |
| 第三节 谜一样的屈原之死 | 42 |
| 第二章 认识与评价：屈原思想、 屈原精神与屈原人格 | 54 |
| 第一节 关于屈原思想 | 54 |
| 第二节 屈原精神面面观 | 73 |
| 第三节 屈原人格诸论 | 83 |
| 第三章 发展与再现：屈原传统的历史命运 | 102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巨人 | 102 |
| 第二节 传播弘扬与变异流失 | 110 |
| 第三节 屈原意味着什么：有多少个主体 就有多少个屈原 | 120 |
| 第四章 历史的具象：传统中的共鸣 | 124 |
| 第一节 “离骚”与庄子及佛和酒：古典时代 的个案研究 | 124 |
| 第二节 在新文化思潮激荡下的屈原 | 144 |
| 第五章 冲突与融汇：屈原的文化归属 | 164 |
| 第一节 文化视野：屈学研究新气象 | 164 |
| 第二节 战国时代的文化精神与屈原精神 | 173 |
| 第三节 屈原的文化归属 | 180 |
| 第六章 接受与阐释：以现代观念激活屈原 | 202 |

| | | |
|-----|-----------------------------|-----|
| 第一节 | 屈原生命历程的修辞学阐释 | 202 |
| 第二节 | 心灵之光：屈原隐秘而深邃的 心理世界 | 211 |
| 第三节 | 文化哲学光照下的屈原 | 235 |
| | 后记 | 257 |

引 言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中，不应忘记和忽视屈原。因为历史上屈原的实在，屈原诗歌创作的实在，深邃地透视出屈原之魂；屈原之魂深刻地影响了屈原以后中国各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屈原精神、屈原人格，典型而又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精髓。可以说，屈原是以他全部的生命之火塑造了传统文人精神悲剧的典型。用历史的、哲学的、心理的、文化的多元视角，深入地透视、研究屈原的心路历程，对我们形象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认定它的价值，反省它的缺陷，弘扬它的优秀传统，无疑是一项长期的、重要的文化工程。

对这样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其研究方法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我们必须说明：文化工程与建筑工程存在一个常识性的区别。建筑工程，人们总是探求对一种最佳方案的抉择；而文化工程则根本无法存在最佳方案。方法的多样化是它的特性，“殊途同归”、接近真理，是人们永无休止的共同追求。日本汉学家、九州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冈村繁教授曾激烈地批评“历来的楚辞研究……都可说是用预先准备下的古来传统观点这一标准尺度去衡量从作品中得出的感觉”，“随心所欲地

推测各篇作品的创作时期和创作动机”。^① 在楚辞研究史中，这种“先入为主”的固定模式和研究方法，确实障碍着对活生生的文化现象、生命现象的深入探讨。但冈村繁将之批评为“历来”如此，却未免有一叶障目之嫌。事实上，在古今的楚辞研究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观照屈子生命历程与创作实际的研究中，涌现出大量的闪耀着理性光芒的研究成果，是绝非遵循一种批评观念且是僵死错误的观念所能完成的。应该说，理解的过程，批评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创造行为，它可能成为多种多样的创造结晶。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创造”绝非指那种不顾实际的天方夜谭，而是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而又审慎的理解与发掘。因此，这里并不存在方法的优劣问题。即使采用类似或同一种研究方法，也可能得出泾渭分明的不同结论。比如冈村繁教授通过自身的方法，得出《离骚》、《哀郢》“均非屈原自作”，断定屈原只是“出现于楚国衰亡时期的具有悲剧色彩的忠臣”，并非“楚辞文学伟大作家”。然现当代中国楚辞学家姜亮夫教授从《远游》的微观研究中，采用类似方法，却得出“《远游》是屈原思想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孰是孰非？在学术真理的探索中，任何人试图充当公正的法官都是徒劳的。只有默默地、不辞辛苦地爬梳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又能以敏锐的现代眼光和思想去激活历史，似乎才能接近真理的彼岸。

屈原研究，应该是建立在宏观文化背景下的考察，但又不宜忽视微观的“文本”分析；在方法上可以“兼收并蓄”，

^① 见冈村繁《楚辞与屈原》，发表于《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8集。转引自《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一辑。

最终是为了建构完整、科学的“屈原学”做出自己的努力。屈原及其创作，不仅是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也是生命现象。屈原自沉，就是一种极其痛苦的生命现象。闻一多先生早就说过一句非常深刻又耐人寻味的话：“研究屈原，应该以他的自杀作为出发点”。但是，恶势力过早地夺去了闻一多的生命，他的未竟事业，只有由我们后人续作了。因此，我们应该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探寻屈原灵魂的归宿。研究屈原的士人人格，研究屈原精神的内涵，以便由此探索中国传统士人格的价值取向，人格悲剧的真正原因。屈原太独特了！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象屈原那样，牵动着中国传统文化。屈原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创造性的贡献。

1991年10月，在天津召开了“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全国学术讨论会。会议不仅邀请了屈学研究工作者，还邀请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的学者与会。力图从各自角度观照屈原，为屈学研究注入新鲜空气。

这是一次成功的学术讨论会。它的收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会议对屈原人格、屈原精神、屈原传统、屈原文化渊源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从屈原研究的历史动态审视这次会议，应该说许多成果都是颇有意义的探索。第二，这次学术会议，做到了学者之间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与撞击，把讨论引向了深入。

这真是一次难得的学术会议。多学科学者的介入，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屈原研究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将屈原研究与现实生活拉得更近，因而，可以说极大提高了屈原研究对我们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学术讨论会上不同学者间的激烈争论，迸发出了很多闪光的观点，促进了学术的发展。这次学术讨论会意外地成了我们这本《东方诗魂》的撰写契机。本书就

是想通过一次有价值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将“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研究课题做一次巡礼，努力反映这一研究的最新水平。我们择取“屈原精神”为切入点，把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具体、生动的历史现象，从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历史动态中，描述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屈原现象的体认，介绍与评述不同历史时期，研究者们的创造结晶，阐释我们自身的观点。

本书共分六章，三部分。第一、二章，可称为“本体编”。通过“屈原社会角色的判定”，“屈原的思想、精神、人格”，“屈原之死”历史动态研究的描述，条理出屈原精神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士人精神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力求描述出近真的屈原。第三、四章，可称为“影响编”。作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史上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屈原，理所当然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引起重大的影响，形成一种巨大的“屈原传统”。这种“传统”的不同内涵，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其精神的体认与创造。传统失其创造，称不上“传统”，因为任何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和更改传统”。^①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力图在“屈原传统”的传播、流失、变异的冲突的历史透视中概括、提炼出属于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所在。第五、六章，可称为“文化哲学编”。屈原以他独特的艺术创作魅力和精神光芒，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屈原精神世界的广袤宇宙，令人高深莫测，又使人感到温馨亲切。他那痛苦的心灵历程，他的命运交响曲，他的远游还乡，他的死亡之谜真是永远说不尽的课

① E·希尔斯(美):《论传统》。

题。以当代意识观照屈原，是本节的核心内容。这里梗概地阐述了 80 年代以来，在“文化热”“方法热”的影响下，屈原研究的新气象，较全面地介绍了那些建立在自身采用的理论基点之上而又具有科学分析的对屈原现象研究的新视角，新观点。

本书的特点是勾勒与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部关于屈原人格、屈原精神、屈原传统的专题研究史的概述，因此，编撰者的观点就在描述与评介之中。我们力图在屈原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渗入与契合中，通过具体的“这一个”的哲学、心理、文化的透视，使人们能更深刻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价值取向、传统士人的精神悲剧。在文化深层次的思考中，全面而又准确地理解代表我们东方民族的文化巨人、性格巨人——屈原的内心世界。正如前文所述，建构完整的“屈原学”是一件重要的文化工程，我们仅仅做了一点尝试。但我们深信，屈原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东方的，屈原还必将真正属于世界。

第一章

源头与凭借：寻求近真的屈原

历史的长河汹涌澎湃，滔滔巨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要求，但也是一项艰难卓绝的文化工程。屈原，这位曾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距离我们是如此遥远。他彪炳千古的伟大诗篇至今为人称颂，但作为一个诗人和政治家，他那磊落胸怀和坎坷际遇，他那高冠长剑和奇服异饰，他的音容笑貌和追求理想不得的慨叹悲吟，却由于漫长岁月的冲刷而变得扑朔迷离。两千多年以来，多少文人志士、多少著名学者，在他们体认与潜心钻研中，力求还原一位历史上伟大的“近真的屈子”。然而，毋庸置疑，“一千个人的心中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这本身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在血与火的历史长河递变中，人们体认屈原，必然投进主体的心灵观照，甚至用自己的理想给屈原罩上各色的光环，或蒙上层层雾霭。几千年来，前人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幅不同的屈原画像，哪一幅没有带着绘画者强烈的主体色彩呢？所以，“欲识屈原真面目”，必将成为屈原研究者永远不尽的追求。

然而，科学研究不能不基于一个坚实的可靠的凭借。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魏际昌教授在“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上说：“我们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但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们应该还他一个历史的屈原，要还他一个历史时期，以及当时的

道德标准、社会情况、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的屈原，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历程！屈原本体研究无疑是屈学研究的根基与凭借，或者说是一个源头。对于这个源头，我们面临着资料匮乏的困扰，除了屈原给我们留下的带有明显艺术想象和比喻象征色彩的大量诗歌文本外，早期的记载只有寥寥千余言的《史记·屈原列传》。让我们从这个源头开始我们的跋涉，去寻找一个近真的屈原。

第一节 屈原社会角色的判定

一、作为政治家的屈原

研究屈原的思想、精神与人格，有一个不能回避的前提，就是对屈原生活实践中社会角色的判定。屈原的光辉浪漫主义诗篇之中，不但反映了他一生在政治上的坎坷困顿，而且闪耀着灼目的思想家的光辉，同时还挟带着强烈的楚文化特有的巫学色彩。几年以前，已经有学者争论屈原首先是一个诗人，还是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的问题。由此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极大兴趣。

1990年，张正明先生撰文^①，甚至抛弃了政治家与诗人二者孰为先后的次序之争，而断言“已知的史实不足以证明屈原是政治家”，也“很难称之为思想家”，“屈原就是屈原——一位志洁行廉的伟大诗歌艺术家”，“一位无与伦比的巫学家”。他认为，经邦理国必须有足以左右局势的经验，才称得上是政治家；必须能循着历史运行的轨迹引导社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前进，才称得上是伟大的政治家。而屈原虽然志洁行廉，娴于辞令，却拙于谋略，狷介孤傲，没有审时容物的非凡气度，连一个上官大夫的谗言也对付不了。所以，“屈原只是艺术家，不是政治家”。

^① 《屈原二论》，载《云梦学刊》1990年第1期。

有的学者却不同意上述意见。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葛荃在《走出忠君的梦魇》一文中认为，从屈原自身的主体自我角色意识上，屈原是一个政治家是确无疑义的。他认为，从行为主体本身来看，屈原作为一个政治家，对于自己在政治生活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应处的位置和应有的作用有着清晰的认识。“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开篇伊始的独白就展示了一个身世高贵、品德高洁、才华出众的自我。与之相应，在政治生活中，屈原认为自己是革除弊端、救治楚国的主角，在楚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因而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颇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概。这种清晰明确的自我认识是指导屈原政治行为与选择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换言之，正是由于屈原有着明晰的政治角色自我意识，才使他真切地体察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孤寂与悲哀，从而给他的政治人格增添了个性色彩。

南开大学中文系郝志达认为，从屈原的生活道路来看，屈原“为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起码可以说明，屈原曾一度在楚国政坛上十分活跃。而且，屈原一生以兴复楚国的政治活动为己任，他在一个国家中，从事最高层的政治活动，并以存君兴国为终生奋斗目标，无疑可以说是一个职业的政治活动家。

如何看待上述的观点呢？应该看到，强调屈原是诗人不是政治家，是什么不是什么，实际是关于屈原社会角色判断的一个误区。这种对立二分的绝对观点忽视了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如

果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划分，往往一个人物可以同时充任不同的社会角色。屈原的政治家身份不仅仅是他所充任的包括诗人、思想家等等的各种社会角色中的一个，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屈原积极密切地参预了楚国怀襄时期的政治活动，具有相当重要的政治地位和很强的参政能力。而且，屈原的光辉诗篇之所以千古流传，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他的诗歌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吟，而且是楚国政治现实的广阔反映，是屈原政治经历的再现和政治情怀的抒写。正如詹安泰先生所说：“在我国古代文学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把一生的政治斗争的实践过程和自己的文学创作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写出一篇具有象政治论文一样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雄丽的诗篇可以和《离骚》媲美的。”^① 屈原的诗篇中，不但充溢着南国浪漫奇瑰的巫风色彩，而且浸透着深刻的理性思维和强烈的政治内容。这也是屈原不仅仅是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而作为更重要的一个文化传统人物存在于中国人心中的根本原因。

二、作为思想家的屈原

“美政理想”是作为思想家的屈原的核心问题。屈原的“美政理想”很久以来就是历代评论家的热点话题。建国后几十年来一直是肯定为主。一般认为屈原的美政理想内涵为：外交政策主张联齐抗秦，内政改革要修明法度举贤授能，振兴楚国，进而实现楚国对天下的统一。近年来，对美政理想开始提出异议，“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更深入地分析了屈原美政理想的具体内容，而且在对其政治思想的评价上提出了不同的新见。

^① 见《离骚笺疏》。

浙江师范大学黄灵庚将屈原人格的“中正”与美政理想联系起来观察。他认为，“美政”即“美正”，屈原一生正道直行，视“中正”为至善至美，体现于他的政治抱负，便是“美政”。屈原的美政就是竭智尽忠地辅佐楚王实现禹汤文武三代圣君的清明政治，核心思想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以此美政治国，在君王方面，必须达到禹汤文武那样哲王水平；在人臣方面，必须具备咎繇、伊尹、吕尚一样的贤智。君臣遇合，而且双方都应以中正精神为准不断完善自己的“修能”。屈原“独好修以为常”，以中正为标准，把自己铸造成为志洁行廉，具有高风亮节的贤能之士。他诗作中佩芳饰玉等大量喻词，是他高洁忠贞的象征。屈原还把以中正为内涵的修能由自我向君王和同列推宕，他以“导夫先路”为己任，奔走呼号于幽昧险途，为楚国走上正路而尽职，他不顾身殃，一再揭楚王逆鳞：“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何独乐斯之謇謇兮，愿荪美之可完”。直言规劝楚王学习耿介专一正道而行的尧舜。他还切望同列众臣律己修能，这体现在他为君王荐举培育各种人才方面，“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竣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前人指出，兰蕙诸芳均喻屈原荐拔的贤良国士，王逸《离骚序》谓屈原任职三闾，掌王姓屈、昭、景三族，“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励国士”，可参说明。

武汉大学蔡守湘、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朱炳祥先生则把屈原美政的内容与中原思想进行了对比研究。他们指出，屈原的美政理想，是吸收了产生于北中国的儒法两家思想精华而形成的。屈原的美政理想有三个内容：一是主张以德治国，与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相一致。二是要求打破等级界限，直接从民间选拔贤能之士。这种举贤授能的思想，排除了儒家思想的落后一面，

打破儒家由“亲亲”出发、选拔贤才要“卑不逾尊，疏不逾戚”的等级范围，从而与法家思想一致。三是提倡法制，但要济之以德，又排除了法家严刑峻法镇压民众的暴虐一面。作为屈原思想核心的美政理想，体现了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要用他的美政理想来振兴楚国，使楚国担负起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这与南方的巫风文化是毫无沾染的。

天津社会科学联合会臧策则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屈原由于自恋而导致自我理想化。由此进一步导致他的政治主张理想化，使他的“美政”也趋向至善、完美和无限，从而只具有审美价值，缺少可操作性，因而不具备多少现实意义。在他的美政中，除了“及前王之踵武”，“举贤而授能”和“循绳墨而不颇”等有限的几句口号外，看不到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施政纲领和实施步骤。“前王”之政只是美好的传说而已，怎么能及其踵武？举贤而授能的潜台词则是：舍我其谁也？因为屈原并不承认同时代还有贤者存在。“举世皆浊我独清”是屈原自我理想化心态的真实写照。屈原的美政，实际上是他自我理想化的扩大和延伸，是以自我想象的产物对现实社会的苛求。与他的美政相比，更富现实意义和实践精神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都被历史证明行不通，屈原的美政更是在任何朝代都无法实现。

南开大学历史系刘泽华、李宪堂分析了屈原美政理想中的“崇圣”内涵，指出了它的积极意义，我们在第三章第三节中再作详细介绍。

屈原的“美政”思想是他哲理思辨与情感抒发的核心。“美政”的具体内涵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建国以来40年的楚辞研究史上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是基本采取回避的态度，认为“后来的人们对于屈原的热烈的同情和崇敬，与其说在于他的政治理想的具体内容，毋宁说更在于他对理